

辛亥革命以前時期之孫中山與梁任公^{*}

- 應付理想與現實之分岐 -

閔 斗 基^{**}

I

在辛亥革命以前一段時期，梁任公是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最緻密的，最尖銳的批評者。在1905年寫的『民報』的「發刊詞」孫中山第一次公開發表了他的革命理論大綱以後，又在1906年12月2日發表的紀念民報一週年的演講里，闡明了更加具體的革命理論。梁任公對『民報』為中心的孫中山一派的革命理論已經通過他自己主編的『新民叢報』加以批評。他在『新民叢報』第四年第十四號發表的「雜答某報之第五，社會革命果為今日中國所必要乎」一文是針對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和「紀念民報一週年演講」發表的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理論。現在我將分析梁任公的這篇文章，要摘示孫中山與梁任公兩個人的政治主張的分岐所在。

II

舉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運動派和康南海梁任公為中心的改革運動派有接觸早

* 此篇論文曾在廣州中山大學永芳堂舉辦的「第二次孫中山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1994.10.2-10.28)口頭發表的。

** 서울대 동양사학과 교수

在甲午中日戰爭時期就開始。³⁾ 對這一次交流，有不少研究成果已經問世。⁴⁾ 近來在日本發現的新史料證實了已有的研究結果。⁵⁾ 1895年3月，即在日本軍擊敗清軍時，孫中山即見了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中川恒次郎，向他告知了興中會為中心的兩廣共和獨立計劃，向日本求請武器援助。根據中川的報告信所說，孫中山給中川的統領名單中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四個人的名字。康祖詒(有為)也在內。雖然無法證實孫中山交給中川的四個人統領名單是否得到康南海本人的同意，但從孫中山把康南海的名字附在統領名單一事來看，可知這一段時期的孫康交流說之不是無根據的。梁任公在甲午中日戰爭時期已成康南海的得意門生。假如康南海嘗有嚮應共和革命論的一段時期，梁任公必亦踵武其師。這一段時期的孫康兩派交流時間很短。康南海因得到了有力大臣張之洞等的支持，就改變了其政治態度，展開了組織強學會，發行時務報，企圖上奏等活動實際上開始反對革命的改革活動。應注意的是梁任公反對革命的活動不僅反對打倒清朝和建立共和政體的運動，也還反對孫中山也後來主張的均貧富黨的社會革命。⁶⁾ 早在孫中山提出均貧富為目標的社會革命以前，梁啟超和他的摯友譚嗣同等對西方之均貧富活動(社會革命活動)已有相當的知識。梁任公主編的『時務報』多次刊登了已在歐洲活動的「均貧富黨」「變政之黨」的各種活動消息。對西方均貧富黨的活動特別敏感的是譚嗣同。譚嗣同對均貧富黨的活動基本上贊同，不過他認為從尚在商、工業幼稚段階的中國現實來看，中國還沒有展開均貧富活動的餘地。他認為中國的最急迫的應是發展商工業創出更多利益。⁷⁾ 對梁任公來說，他不像他的朋友，不遑明白地闡明他對社會革命的態度。不過，從他寫的「論中國之將強(『時務報』第31冊)」來看可窺知

3)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965，臺灣商務印書館，臺2版，pp. 71-72.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臺灣世界書局，1954年影印 pp. 40-46.

4) 張朋園，『梁啟超與辛亥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

閔斗基，「戊戌改革運動時期之改革與革命」(韓文)，『東洋史學研究』9，1975；

孔祥吉，「孫中山康有為早期關係探微」，『清史研究集』6，北京，1988

5) 狹間直樹，「中川恒次郎報告孫中山革命活動的信」，『歷史檔案』86-3

6) 閔斗基，「戊戌改革運動時期之改革與革命」(韓文)，『東洋史學研究』9，1975

7) 同上註

他的立場基本上是和譚嗣同一樣的。他指出了「西國機器日盛工廠所容之人日夥，爭工價，爭作工時刻，抑脅廠主相率罷役之事輒數十見」。不過在(機器還沒日盛)的「中國，操業最勤，其費用(工價)最儉，作工時刻可以培增，可以用吾之所短以持西人之所表」。從這段文章我們可以窺知梁任公也不贊成在中國容許認均貧富為目標的活動(孫中山的所謂社會革命)。

III

在國內一向持相反路線的孫中山和梁任公在日本巧遇了。戊戌變法失敗以後，虎口余生心有余悸的梁任公開始漸變其政治思想上的路線，鼓吹民權和共和之美。因此梁任公和孫中山的交流在1899年又開始了。⁸⁾ 孫梁兩人「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約聚談」(直到天亮談話)⁹⁾。梁任公對孫中山說「弟數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國之獨立，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¹⁰⁾。他的意思表明他將要改變方策和孫中山一派合作參加革命運動。不過，康南海之對梁任公的壓力迫使梁停止對孫中山的接近。之後，梁任公之政治思想又轉變了，開始批判孫中山一派的革命理論。¹¹⁾

孫中山在1905年組織同盟會以後發表了對革命運動竟成爲一個綱領性的文章。這就是「民報發刊詞」。在這發刊詞里，孫中山特別強調民生主義。他認爲因爲歐美各國社會貧富不均日深，大同盟罷工，無政府，社會黨日熾，社會革命的發達其將不遠。在中國因爲貧富不均之禍害不深，中國獨受病未深故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社會革命就是他所提出的民生主義。他

8)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p.94.；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pp. 44-47.

9) 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張朋園，『梁啓超與辛亥革命』p. 121 所引

10)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p. 45.

11) 張朋園，『梁啓超與辛亥革命』pp. 167-175.

的主張給追隨他的青年革命家表現了一個新的理想。不致悲觀中國「文明發達」之落後，反而擁有一個將超駕歐美的信心。第二年，那1906年12月在此報發刊一週年紀念會上，孫中山發表了具體的革命綱領說明。不若「民報發刊詞」僅提出了民生主義的大綱，在這篇演講里提出了以解決土地問題為實行民生主義的具體方法。「民報」刊登了這篇演講文在「民報」第10期(1906年12月20日)。當然梁任公的批判對象不是他，就是這篇演講。

按照孫中山的說明，政治革命成功後中國一定會有文明發達(商工業發展)。商工業發達(交通發達)使地價日漲。國家，不是地主，應享有從地價產生的利益，不讓少數地主持文明發達所產生的幸福(利益)。這可以叫作圖謀平等的社會革命(民生主義)。革命成功之初，尚在文明未發達時期，一舉實行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預防富者日富貧者日貧。社會革命實行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國家但收地租一項，已可成為地球上最富裕的國家，不讓中國再落人後。孫中山畫的玫瑰色的畫不盡此，過去的苛捐盡數蠲除，物價也漸便宜，使人民漸富起來。社會革命的主要目的是不願少數富人專利故，從其基本性格來看和不願君主一人，少數滿洲人專利的政治革命一致，可謂「為衆生謀幸福」之舉。

梁任公在他的「雜答某報第五」中的「社會革命果為今日中國所必要乎」一文中，提出三個不行，便是社會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¹²⁾ 最重要的論点是梁任公不同意孫中山立論的大前題；文明之發達引起貧富不均。梁任公認為將來的貧富不均不僅由「文明發達」而也產生於從文明發達以前的經濟社會的不完善。梁任公還對孫中山所說因有商工業發達兩度革命不可避免之主張可批評了。他認為發展生產所需要的資本可以用股分公司的招股形成而中國(在革命之初)貧富之不均既不深故股東應是多數之中產家。他認為這就是中國將來社會分配均善之朕兆；因此儘管文明發達，社會革命也不必行。梁任公還主張「今日中國所急當研究者乃生產問題非分配問題也，何則生產問題者國際競爭問題也，分配問題者國內競爭問題也，生產問題能解決與否則國家之存亡係焉」。因此他將要主張

12) 「新民叢報」第4年14號

之經濟政策應是獎勵保護資本家併力外競為主而其餘皆輔。的確，在這一段時期孫中山既沒提過革命之初如何發展生產，如何形成資本故毫無懷疑地說革命一旦成功則文明(商工業)自然會發達。加之毫無注意國內資本與外國資本之競爭。因此梁任公對孫中山舉香港上海的地價之漲價為例證明文明發達與地價之關係批評相當尖銳。梁任公說使香港上海地價之漲價是外國資本，並不是中國國內之資本。所以梁任公竟說「欲解決社會問題者當以解決資本問題為第一義，以解決土地問題為第二義，且土地問題雖謂為資本問題之附屬焉可也」。因孫中山還未談及定地價之具體方法，梁任公又以確定地價的時期，歸公以後的土地的性格等技術性問題加批評平均地權論。梁任公的結論是平均地權不可行而實行單一稅可使民足國裕的玫瑰色的政策也很難實現。

IV

梁任公之批評有的地方確是不完善的孫中山平均地權理論，確是言之有理。不過梁任公單只汲汲批評孫中山所說之不圓而且並沒有提出可代取平均地權理論的系統的新理論。他根本沒有像孫中山的一舉兩得的有遠見性的立場。這可說是區別孫梁兩人的最重要的特點。其次梁任公沒有像孫中山那樣向民衆對特別關懷的態度。孫中山在民報一週年紀念會上演講說得好「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為衆生謀幸福」¹³⁾ 根據梁任公自己所說這「衆生」就是貧困的農民和工人。

梁任公和孫中山很接近的1899年，在東京上野的精養軒餐廳孫中山嘗給梁說「今之耕者率貢其所獲之半於租主而未有己，農之所以困也，土地國有後必能耕者而後授以田，直納若干之租於國而無復有一層地主從中賸削之則農民可以大蘇」¹⁴⁾

13) 『民報』第10號，臺灣，中國國民黨黨史會，1969年影印，p. 12

14) 梁啟超，「雜答某報」，『新民叢報』第4年14號，臺灣藝文印書館1966年影印本，p. 32

又同一年夏天(己亥 七月) 孫中山在任吉亭(犬養毅邸?)三更擁被的孫中山對梁任公說道「大亂之後人民離散田荒不治舉而奪之」¹⁵⁾ 梁任公是否正確傳述孫中山所言不得而知, 孫中山對農民的關懷則可窺知. 這種對民衆的關懷便是梁任公所缺也. 梁任公更說「吾但知資本家之一詞孫文最嫌惡也」¹⁶⁾ 這一句就反映了孫中山之關懷工人之心. 對強調資本比分配還特別強調的梁任公來說, 這種對工人的關懷則好像不必要的. 早在1902年梁任公討論四大自由時, 提到了經濟上(生計上)之自由. 他說生計上之自由者資本家與勞力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¹⁷⁾ 要注意的是提及政治, 宗教, 民族上之自由則用“對(立)”觀念說明其積極性之自由, 而論到經濟上之自由則單用“相互”和“保”觀念說明其自由之消極性與調協性. 可知梁任公之經濟思想社會思想當中, 早就沒有和孫中山一樣的對勞力者的特別關懷.

如上所述, 孫中山之理想太高而現實社會革命論的邏輯則不完善又是迂遠. 的確, 孫中山的這種不完善的邏輯和理想太高的迂遠直到逝世一直使他困惑.¹⁸⁾ 不過身爲一個革命運動的領袖, 對於他來說急務應是動員對現實問題不滿的青年們, 使他們的迫切不滿轉成革命行動的力量. 對這些青年們還談及迂遠的不完善的邏輯和理想, 這便是一種冒險. 孫中山革命論的迂遠和不完善不止於社會革命論. 梁任公認爲他的政治革命論, 包括多段階革命論和依靠“民氣”的有秩序的革命論等等, 也是迂遠的, 其邏輯是不完善的.

梁任公好像成功了揭破好些孫中山的邏輯的不完善和迂遠. 不過梁任公當時沒覺察到基于對農人, 工人的關懷的孫中山的迂遠的理想主義(與民生主義)比他自己的才華和銳利邏輯長生. 對梁任公個人來說, 他不久就覺察到他真的錯了. 5年後, 他看到了粵省人民之對在廣州起義的新軍充分關懷, 傾嚮革命, 他不得

15) 梁啓超, 「雜答某報」, 『新民叢報』第4年14號, p. 36.

16) 梁啓超, 「雜答某報」, 『新民叢報』第4年14號, p. 26

17) 梁啓超, 「新民說 9, 論自由」, 『新民叢報』第7號, pp. 1-2

18) Min Tu-ki, *Economic Equality versus National Wealth ; The Economic Priorities of Sun Yat-sun and Tan Si-tong*, Eto & Schiffrin e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forthcoming

不說道；「要之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革命之論誠不能自完其說。在今日之中國而持非革命論其不能自完其說抑更甚。」¹⁹⁾

19) 梁啟超,「粵亂惑言」,『國風報』第2年第11期,1911年5月9日